“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成就、困境及出路

吴 夏 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阳 550001)

摘　要: 三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具有特色的研究范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学术格局,推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其学术渊源,根植于西方文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贯通融合,是中西文化交汇在学术中的体现。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不少问题,比如未能对“与”的含义进行充分理解和发掘,过于重视文学外部研究因而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学内部的审美问题,制度与文学关系史的梳理偏于简单化和直接化,研究中过于依赖数字检索因而造成知识性错误等等。有鉴于此,未来研究不仅要反思中国文学与西方文艺理论之间的适应性问题,更应重新思考制度起源,并由此建构新的研究理论和学术方法,在跨学科研究中尽可能避免知识性错误以及“伪考据”“伪学术”等现象。

关键词: 制度与文学;学术史;成就;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I 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5-0124-10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迄今,“制度与文学”研究已走过三十余年历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产生各种困扰。如何有效突破困境,使之更好地发展,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反思。笔者曾对“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及其发展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①本文即在原有基础上,从研究进程、学术成就、理论渊源、局限与困境、突破和发展等方面作进一步论述。

一、“制度与文学”研究进程及学术成就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唐代科举制度与诗歌的关系开始为学界关注。直接以“制度”为论题者,先后就有日本铃木虎雄《唐代考试制度与诗赋》和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之关系》等文章。②1980 年,程千帆先生发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不仅深化了对此问题的认识,而且还创新了研究模式。不过,直接影响“制度与文学”研究格局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则是傅璇琮先生发表于 80 年代中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近三十年学术史表明,“制度与文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纵通和横通两方面展开。纵通是指以唐代为基点在时段上的前后延展。横通是指以科举制度为发端,不断向其他领域拓进。

唐代文学无疑是制度与文学研究的重镇,成果非常丰富。比如科举与文学、幕府与文学、贬谪与文学、铨选与文学、地域与文学、科举文体、乐府制度与文学、政治与文学、文馆与文学、交通与文学、教育与文学、谏议与文学、礼制与文学、节日民

收稿日期:2017 - 03 - 10

作者简介:吴夏平,男,江西都昌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书籍活动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4XZW014)。

① 参看吴夏平:《“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和发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关于“制度诗学”:论陈寅恪与埃斯卡皮之异趣》,《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

② 日本铃木虎雄《唐代考试制度与诗赋》一文,由张我军译,载于 1929 年 3 月 30 日天津《益世报》附刊;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之关系》载于《东方杂志》第 40 卷第 8 号,1944 年。参见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 页。

俗与文学等等。① 以唐代为基点，"制度与文学"在纵横两方面展开。纵向方面，比如先秦时段，就出现了周礼与文学、上古文学制度、先秦文学制度、先秦乐制与文学等研究成果。② 也有学者从制礼作乐入手，梳理先秦文体的生成和文献编纂等问题。③ 秦汉文学领域，或对制度之下秦汉文学的精神和品格、文学发展的制度性因素、制式文章的发展等问题进行论述④，或从制度视阈考察辞赋文体的历史变迁，或揭示汉代仕进制度与文学的关系⑤，或研究汉代教育制度与文学创作⑥。魏晋南北朝文学，则分别从选官制度、著作郎官制度等方面入手分析文学与制度的关联。⑦ 唐以后，如宋代文学，出现了馆阁与文学、科举与文学、家族与文学等研究成果。明代文学研究领域，则关注文官制度与文学，书坊制度与小说的关系。清代科举、选官、礼制等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也渐次增多。不仅如此，现当代文学也受古典文学研究风气影响，产生不少论述文学制度、文学奖励机制、文学机构与文学之关系的论著。有学者将此学术路向称为"文史对话"，认为其价值体现在"借助于对社会文化的广阔考察，文学研究这一感性的事业获得了某种史学的坚韧和扎实，因而推动学科走向成熟"⑧。

毋庸置疑，在"制度与文学"研究进程中，傅璇琮先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唐代科举与文学》出版以后，先后有好几位中青年学者，仿其写作格局，撰写类似的选题。⑨ 戴伟华曾直引傅先生原话："如果可能，还可以从事这样两个专题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怎样在地方节镇内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⑩可见，使府与文学研究也受此影响。在傅先生的倡导和力行之下，"制度与文学"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学术范式。从现阶段硕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来看，此范式依然显示出极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综观近三十年研究成果，"制度与文学"的研究主要取得以下学术成就。

其一，改变古典文学研究格局，成为现代学术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近百年来学术历程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一是"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二是"十七年"时期，三是"文革"时期，四是改革开放至今。第一阶段，总体上呈现出旧学与新知交汇的特点。此期另一个重要特点是马克思文艺思想逐渐作用于中国学术。比如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不仅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且要为大众服务，

---

①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 年版。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版。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吴夏平：《唐代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2007 年版；《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济南：齐鲁书社 2008 年版。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赵小华：《初盛唐礼乐文化与文士、文学关系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朱红：《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饶龙隼：《上古文学制度述考》，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罗家湘：《先秦文学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④ 分见徐公持：《"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汉代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文学遗产》2010 年第 1 期；《"礼乐争辉"与"辞藻竞骛"——关于秦汉文学发展的制度性考察》，《文学遗产》2011 年第 1 期；《论秦汉制式文章的发展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12 年第 1 期。

⑤ 韦春喜：《论汉代人才培养、选拔对〈诗经〉的影响》，《文学遗产》2011 年第 6 期。

⑥ 鞠传文：《汉代教育制度与汉代文学创作》，山东大学 2008 年博士毕业论文。

⑦ 王相飞：《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南京师范大学 2008 年博士毕业论文。李猛：《魏晋南北朝著作郎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13 年度硕士毕业论文。

⑧ 李怡：《文史对话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⑨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 版，第 1—2 页。

⑩ 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第 3 页。

为政治服务。① 再如郭沫若先生于 1944 年 2 月发表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一文,自觉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② 但此期马克思文艺理论在学术上还属于“潜流”。第二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马克思理论的社会分析方法成为学术主流。此阶段出版的几部代表性文学史著作,大都遵循这样的学术原则。比如社科院文学所所编《中国文学史》,明确表示:“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③游国恩等人的《中国文学史》也直接说:“力图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④这些文学史著作,作为高校文科教材曾产生广泛影响。但正如学者所批评的,此期文学研究的主体倾向是“庸俗社会学”⑤。第三阶段的文学研究,总体成绩虽不足称道,但从另一角度看,其学术导向及研究成果,为现代学术的反观自省提供了重要参照,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即其著例。⑥ 第四个阶段的文学研究,大致又可分为两个小的阶段。80 年代,一方面是学术“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理论饥渴式的学习,并由此产生大量文学选本、鉴赏辞典之类的著作。借助西方理论分析作品已然成为八十年代学术基本导向。90 年代至今,则如上所述,“制度与文学”逐渐成为古典文学主要研究范式之一,改变了以往以作品分析为主的格局,呈现出现代性转换的学术特质。

其二,构建新的文史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是“诗史互证”。“以诗证史”是将文学作品看作历史史料。“以史证诗”是把文学还原到历史时空中去。严格来讲,作为一种学术方法,“以诗证史”发端于刘师培⑦,至陈寅恪而蔚为大观。不过,陈氏虽然强调从人、事、地等要素来研究诗歌,但所关注的还只是具体作家和作品,并未在宏观视野下展开诗人的群体性研究。

作为方法的“制度与文学”,改变了这种研究路向,从宏观上把握文学史发展脉络,将历史与文学进行充分而全面的结合。由此建立的研究范式,是在对历史时期各种制度的充分理解之下,考察文人在历史时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心理历程以及文学创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揭示制度之下文学演进规律和特点,以及制度与文学的各种关联性。这种研究,一方面借鉴参考相关史学成果,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历史研究。相比之下,这种研究比“诗史互证”更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因而也更加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其三,解决了文学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一些重要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入认识。以唐代为例,比如以往认为科举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但经考证,科举试诗赋的时间,大概出现于武周垂拱二年(686),这距李唐立国已有近七十年的时间。⑧ 通过研究发现,初唐诗歌的发展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宫廷中的“准近体”创作,一是古体写作,两种诗体构成对立的两元。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不仅文馆文士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诗歌内部,古体也起着相反相成的促进作用。再比如,科举诗、律赋、策论等文体,其体式的形成和发展都获得很好的制度性阐释。唐代方镇制度、文人幕府活动及其如何与边塞诗发生关联等问题,也得到了合理解释。此外,运用文化地理学理论来研究士族文学,将制度与文学现象统摄于文学政治母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5—433 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第 1 页。

④ 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 页。

⑤ 冯其庸:《关于古典文学人民性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教学与研究》1956 年第 12 期。袁世硕等:《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倾向》,《山东大学学报》1959 年第 3 期。

⑥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⑦ 早在陈寅恪之前,刘师培曾提出以唐诗证史。参见卞孝萱:《现代国学大师记》,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53—54 页。

⑧ 陈铁民:《梁玙墓志与唐进士科试杂文》,《北京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

体,运用社会角色理论分析文人角色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等,都取得重要进展。

二、“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研究呈井喷式爆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译介西方著作,并把相关理论运用于具体研究,比如接受美学、心理学分析、语言学分析、原型批评、集体无意识等等。因此,80 年代产生了大量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确实能一新耳目,给读者带来全新的审美感受。但随着研究工作逐步展开,一些学者开始偏离事实、牵强附会。针对这种现象,90 年代初期,学术界开始纠偏,反思“拿来”问题。

“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正是在上述学术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西方文学社会学理论。傅先生的唐代文学研究,就深受西学影响。他曾说:“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的研究。”①并对丹纳论艺术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段名言,特别揭出:

>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歌唱。
>
>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②

这种思想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实践。在该书中,先生极力强调,要通过跨学科研究,“使我们仿佛走进了那个时代,迎面所接触的是那个社会所特有的色彩和音响”③。

傅先生反复提到的丹纳,是 19 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丹纳认为文学受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影响,种族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而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在丹纳之前,斯达尔夫人于 1800 年和 1810 年先后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及《论德意志与德意志风俗》,从历史和社会环境来系统探讨文学现象。其后孔德创建社会学,把斯达尔夫人的文学理论纳入到实证主义中来。在孔德看来,文学首先是社会现象,文艺研究必须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揭示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斯达尔夫人和孔德的理论,直接通向丹纳的《艺术哲学》。可以说,丹纳的文艺理论是十九世纪文学社会学理论的系统总结。但是,文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建立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埃斯卡皮等人。埃斯卡皮先后发表《文学社会学》(1958)、《书籍的革命》(1965)、《文学性和社会性》(1970)等著作,并在法国波尔各大学建立“文学事实社会学研究中心”(1959)。其基本内容是,文学可以分成生产、发行、消费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他们认为文学事实应当包括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部分。对作家的研究,应当从其社会阶层、职业、地理、时代等层面来分析,因此提出作家世代、文学地理等问题。对文学的发行,提出发行圈子一说,并由此思考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比如作者对话的潜在对象与事实对象之间不一致,因此要分清楚“潜在读者”和“事实读者”。此二者的不同,产生阅读的“创造性背叛”现象。也就是说,读者的理解与作者的本意之间往往难以达成一致。对于文学消费,他认为书籍(文学)不仅可以用来阅读,而且也可以作为商品来消费,比如作为礼物予以馈赠等等。总之,埃斯卡皮提出的各种观念和方法,都是基于“文学事实”的,而不仅仅是文学的。因此,对于文学事实的研究,与以往的文学研究,无论是资料还是手段,都不大一样。他认为文学事实资料“要通过对围绕着文学事实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对文学事实起制约作用的各种技术

①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 页。
② 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第 1 页。
③ 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 2 页。

手段的研究才能获得"①。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被译介至我国后,对当代中国学术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就直接受此启发。王兆鹏先生曾自述其学,坦言"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等理论著作"②。他的一系列关于文学传播的研究论著,显然与此学习经历有关。至于曾大兴等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程国赋等人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毋庸置疑,也是借鉴文学社会学的结果。

但是,"制度与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并非全受西方文论影响,其间还有中国学术传统的作用。这就不得不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陈寅恪热"。据笔者统计,近四十年有关陈寅恪的研究著作近百部,研究论文 900 余篇,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究其实质,这是"文革"之后学术"拨乱反正"的结果,是以批判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为开端的。从 1978 年开始,萧涤非、谭其骧等人发表大量文章,批评郭著的各种失误。在"陈寅恪热"过程中,傅璇琮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陈氏学术思想的论文。③ 可以说,傅先生对"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思考,在丹纳《艺术哲学》之外,还与陈寅恪先生有关。从傅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学习及具体研究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学术对他的影响。由此可见,"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渊源,既有西方文学社会学的一面,又有中国学术自身传统的一面。其研究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结果。

三、"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困境

经过三十年余年发展,"制度与文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但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对"与"的义涵认识不够清晰。"制度与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是制度、文学?还是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这个问题往往困扰研究者,以致有一段时间曾比较热烈地讨论历史本位与文学本位问题。④ 确切来讲,"制度与文学"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和新视阈,应从制度入手解决文学问题,最终落脚点应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但"制度与文学"的研究,又非简单的作家和作品研究,其重心是揭示和解释制度与文学的互联互动。所以,在重视"制度""文学"之外,还必须思考"与"的内涵。"与"不是"和",也不是"及",它所表示的不是两个事物的并列或综合关系,而是事物之间的内外关联。程千帆先生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唐代进士行卷对文学的作用,包括"促退"和"促进"两种。⑤ 也就是说,既要研究行卷风气,也要研究文学,但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二者本身,而是二者之间的"进""退"关系。

从已有成果来看,对"与"字义涵理解偏差的主要表现有三种。一是"制度 + 文学"。这种研究,制度考辨往往做得比较好。但其中的文学研究却似乎与制度毫无关联,把"制度"和"文学"当作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因此,这种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事物的关联性。二是制度多而文学少。有些论著甚至并未就制度与文学展开论述,但却标之以"某某制度与文学"的论题。因此,难免使人怀疑,这到底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相对来说,上述两种现象比较容易发现。三是事物关联性研究的缺失被遮蔽。这种遮蔽来自于主题先行,也就是先存某种观念,在假设中认为某种制度对文学产生影响和作用,为了证明判断的正确,而

---

①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1—52 页。

② 王兆鹏:《求学之路》,《中文自学指导》1997 年第 3 期。

③ 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华文化》1989 年第 1 期;《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清华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陈寅恪文化心态与学术品味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1 年第 3 期;《略谈陈三立——陈寅恪思想的家世渊源试测》,《中国文化研究》1993 年第 1 期。

④ 赵义山:《历史本位与文学本位》,《文学遗产》2007 年第 2 期;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 年第 1 期。

⑤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 88 页。

在论述中作一些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解说。上述情况的前两种,研究者忽视了“与”的意涵。后一种,研究者本想解决“与”的问题,但本末倒置,未能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

其二,“制度与文学”研究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发生发展的外部问题,但对文学内部的审美研究却很难发挥作用。以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为例,已有成果比较好地解释了制度对唐诗的影响,也比较好地分析了各种文体的生成和发展问题。但是,很难解释为什么盛唐会出现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也无法对诗歌等作品进行艺术性阐发。这就是“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最大局限。它能在宏观上,从全局性和整体性上去揭示文学史发展的社会动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梳理文学史演进脉络,但在分析具体作家的个性特征、具体作品的审美艺术上,似乎无能为力。

当然,也不乏从制度分析作品的成功例子。比如,从军事制度切入,以杜佑《通典》所载“举火”及“烧柴笼”的不同含义,来解释“大漠孤烟直”的真实含义,从而得出报平安和颂边将的诗歌主题。① 再比如,通过对“督邮”官职的具体考察,发现该职本为汉晋州郡所设监察官,负责对属县官吏进行督查,从而重新检视陶渊明辞官的真实原因。②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对诗歌反映出来的各种制度进行具体阐述,比如邓小军等人所著《唐诗说唐史》。上述种种情况,实际上都未脱离“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的范围。

“制度与文学”虽与“诗史互证”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但本质上,二者还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在“制度与文学”学术范式中,还有一个西方文学社会学的源头。“制度与文学”关注的对象是作家群体性的社会活动,以及这个群体活动与文学的关系,属于群体诗学的范畴。这一点,西方文学社会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德国文艺理论家托菲认为,文学本质的概念和文学功能的概念是无法沟通的。他要求严格区分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社会学之特殊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探讨的是人的社会行为亦即人际关系,文学只有在它展示特殊的人际交流的地方,在它关系到人的文学活动时,在它呈现文学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才具有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指出,文学作品的阐释说到底仅有两种不同的主要方式,也就是内涵阐释与功能阐释。内涵观察方法视作品为艺术领域内的精神形式,并试图解读它的特殊构造(素材、结构、内容)。功能观察则将视线对准作品所依托的个体和群体的存在,对准作品之“存在的功能”。曼海姆虽然指出两种阐释方式不能绝对地强调其中的一种,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但是对于文学社会学来说,这两者之间似乎天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③ 相对来说,中国传统的“诗史互证”偏重于内涵阐释,而“制度与文学”则偏向于功能阐释。因此,两者虽可互补,但要弥合隙漏、泯缝疆界则是很难的。

上述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或者说目前研究中存在的缺憾,似乎不仅仅是方法和视野的问题,还与文学社会学本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有关。“制度与文学”如何能够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

其三,制度与文学之关系的论述过于简单化。事物发展往往一果多因。从逻辑上来说,新事物的出现必须同时具备必要和充分两个条件,而充分条件只是促使新事物产生的可能性要素。当前“制度与文学”的研究,比较重视在制度上论述文学史的可能性,而没有很好地论证必然性。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呈现出由此至彼的简单对应,既单一又片面,难以令人信服。比如,前文所述科举与近体诗的关系,科举试诗赋固然激发了应考举子学习近体诗的兴趣,这个现象诚然也是近体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科举与诗歌之间并非直接对应关系,其中还有教育等其他制度的桥接作用。如果没有对初盛唐官学教育进行系统研究,

---

① 吴夏平:《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第 1 页。

② 王青:《陶渊明辞官归隐原因新探》,《博览群书》2002 年第 9 期。

③ 方维规:《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社会科学论坛》2010 年第 13 期。

就很难真正揭示科举与唐诗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古近二体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诗歌演进内部来讲,古近诗体的二元对立,是促进近体诗发育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把科举、教育、古近二体对立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讲清楚,才能揭示近体诗发展的真正动因。

再如,唐代史官与碑志文体的关系,以往研究也偏于简单化。根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设史馆,把国史修纂职能从秘书省著作局中分离出来,从此著作郎被罢史职,而专掌碑志、祭祝之文。依据这些记载,是否就能推论出碑志文的变化与秘书郎官职能转变有关呢?考察某种制度的存在与否,不能仅看文献记载,还需从具体史实中看其执行情况。有些制度在文献中有记载,但现实中并未真正实施。这就提示我们,必须考察著作郎官职务变动的实际执行情况。根据笔者研究,初盛唐时期,著作郎官兼任史职的现象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近 130 年的时间里,还比较好地延续了著作郎官修史的传统。但中晚唐却未发现一个著作郎官担任史职的例子。① 这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另外,墓志中所载署名著作郎官的,也大都属于私人修撰性质。所以,著作郎官到底是否像史书所说那样专司碑志文,在找到确切依据之前,尚应存疑。不过,两《唐书》关于著作郎官专掌碑志文的记载,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反映出唐代碑志文存在官修和私撰两种情况,作者身份值得注意。从墓志所载张说、张九龄等曾以朝廷重臣身份修撰碑志,以及中晚唐多有翰林学士撰制碑文等情况来看,可知私撰之外确有官修。据此,从墓志官私共修来研究其文体发展路向,还是可行的。② 但要得出著作郎专修碑志的结论,尚需更多的证据。

其四,知识性的缺陷和错误。由于研究者对制度本身的认识还不够准确,以致出现不少失误。比如,傅璇琮先生曾指出,白居易所任翰林学士是职,而同时担任的周至县尉、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等是官。"凡翰林学士,都须带有官衔。……这是因为,翰林学士本身是一种职务,他必须带有其他正式的官职名称,这样才有一定的品位,一定的薪俸。而同时,不管所带的是什么官衔,他仍在内廷供职,承担翰林学士的职能,并不去做所带官衔的职务"③。由此可见,职是实际从事的职务,官则是俸禄之所寄。有些学者搞不清楚官和职的区别,认为白居易思想由积极转为消极的分水岭,发生于元和五年(810)由左拾遗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之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白居易元和五年前后任职翰林学士,并不存在左拾遗卸不卸任的问题。其他各朝代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问题。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指出个别研究者没有弄清楚明清时期官职中的虚衔、实授、散阶、勋级、封赠的区别,对官名的各种简称和别称也不了解,因而出现把职官名的全称和省称混用,将一个职官名割裂为两个或多个职官名等失误。④

四、对未来研究的一些思考

如何解决"制度与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怎样突破困境,笔者有以下思考。

其一,反思中体西用问题。此虽是老话题,但在"制度与文学"中有其特殊性,因此,也还有特别讨论的必要。其重点在理论起源、适用疆界、中西制度差异性等方面的认识上。

从起源上来说,西方文学社会学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之上的。18 世纪中后期,法国思想家卢梭先后发表《论科学和艺术》(1750)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将矛头指向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期间所产生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对艺术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思考,提出没有奢侈哪来艺术、科学与艺术稳固了皇冠等著名论断。卢梭认为作家的创作如果要得到社会的

---

① 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第 432—454 页。

② 吴夏平:《从行状和墓碑文看唐代骈文的演进》,《文学遗产》2007 年第 4 期。

③ 傅璇琮:《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起》,《文学评论》2002 年第 2 期。

④ 周明初:《明清文学研究者的职官制度学养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13 年夏之卷。

认可,就必须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相应的社会阶层出发,反映真实的社会状况。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是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也同样受审美者所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影响。① 这样就把文学艺术同社会联系起来,对后来文学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其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提出“时代精神”问题,认为艺术家无可避免地都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② 此后经由斯达尔夫人、孔德、丹纳、埃斯卡皮等人努力,对文学与社会的思考逐渐演变为文学社会学理论。由此可见,文学社会学理论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基于这样的事实,在研究实践时,就必须审慎对待文化移植中的适应性问题。

在“制度与文学”研究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西方理论中所指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西方文学社会学研究者所理解的文学和中国文学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埃斯卡皮认为:“文学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态主要有三种:书、读物和文学作品。”③在他们看来,文学、书、读物三者很难清楚区分,或者说文学必须附属于书和读物。因此,文学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第一是作为交际的文学,文学不仅是物品,同时也是意义。文学只有当它被阅读时才成其为文学,正是作者和读者联合一致的努力才使这种具体而又假想的精神作品得以问世。第二是作为过程的文学,带有一种设想、一种中介物和一种活动的特性。设想即作家构思、期望并完成的那部作品的粗坯。中介物就是书籍,或至少是书面文献。活动则包括阅读和反馈。第三是作为机构的文学。作为机构,文学包括生产、市场和消费。文学社会学把文学与书籍等同起来,文学和书籍同样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通。因此,他们把书籍生产者当作“一种精神上的结丝工人”④,称作家群体为文学人口,研究作家就必须研究文学人口的世代、地理、职业等等。他们关注作为商品的书籍,肯定印刷技术对出版的贡献。他们关注书籍的消费,在消费中讨论文学阅读。这些理论,渊源于资本主义文化,同时也适用于该文化,但与中国文学相距甚远。比如,中国古代作家固然也有地域、职业、世代等群体性问题,但他们不是产业工人,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职业作家。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不仅要注意技术革新——造纸、雕版印刷等——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同时要注意历史深远的口头传统。中国文学的阅读,或许也存在“创造性背叛”现象,但更应关注评点、批注、札记等固有传统。

同时,还要注意,在制度的理解上也存在中西差异性。比如,西方文艺生产中的寄食制,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集团具有一定启发。但同时要看到,西方文艺家与贵族和商人的依附关系,总体上是松散自由的。中国古代的门客、宫廷文人、馆阁文士等,其人身依附,始终无法摆脱与官方的联系。特别是唐以后的馆阁文人,他们所有活动都纳入到整个官僚体系的运作之中。可见,中国古代文士与政治的关系非常紧密,而西方文人则与社会的关联更为密切。因此,两者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段都不大一样,所呈现出来的文艺形态也不尽相同。这些都是研究中必须注意的。

其二,从制度的起源和特质来理解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关于制度起源,中西学者都曾有过积极探索。章学诚认为,远古社会人口日增,事务渐繁,“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⑤。在章氏看来,制度是为了适应人类的分工合作、均平秩序之需而产生的。卢梭认为,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仅凭个体力量难以生存,必须聚

① 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501 页。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4 页。
③ 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6 页。
④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6 页。
⑤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19 页。

合众力才能获得生存。为了保证汇合众力的过程中每个个体的利益不受侵害,必须要有相互的约定。这就是契约,也就是制度的原始形态。①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描述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蒙昧、野蛮和文明三种形态。在他看来,如果将各种制度按照其出现的顺序向上逆推,就会看到制度是不断扩展的,是从为数不多的原始思想幼苗中发展出来的。② 恩格斯认为制度的产生,是原始社会高级阶段经济条件发生变化,迫使氏族社会解体所导致的。③

从中西学者论述来看,制度源于人类发展需要。制度所面向的对象是人,具有制约、规范、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功能。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正式制度,还是传统、习惯、风俗等非正式制度,都具有权威性、集体性和公约性。制度本身含有人性的全部内容。作为人学的文学,在这一点上与制度是契合的。从文学发生来看,制度与文学是同条共贯的。以“文本于经”为例:比如,《尚书》是对不同政令的记录和整理。《诗经》是娱神与娱人活动的载录。《春秋》的修纂,不仅为保存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藉此推求政教之道。《仪礼》记载了不同群体的各种活动规则。《易》则是对远古以来人类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总而言之,“五经”不过是先民活动的记录,制度在其中,文学也在其中。从这一点来说,制度与文学是共生的。

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制度的影响,文学活动也莫不如此。对于制度的约束和引导,文人主要有三种行为方式:顺应、对抗和逃避。逃避其实也是对抗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性质是消极的。与此相应,文学也呈现出三种基本形态:一种是顺从的,表现“出义尚光大”“辞藻竞骛的特征”;一种是对抗的,表现为批判、复古的特征;一种是逃避的,表现为隐逸的、萧散的特征。这三种基本形态,既可能是某一群体的,也可能是某个个体的。因此,在研究制度与文学关系时,应有一个统摄全局的观念,并藉以揭示文学与制度联动的复杂性。

其三,尽可能避免知识性错误。“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对制度的正确认识。从方法论角度来说,“制度与文学”实际上对研究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多学科交叉研究,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历史、文学、社会学,甚至教育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各学科的系统知识。这对人文学者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因而研究中容易出现各种缺陷。

上述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知识结构问题,还与数字化时代环境有关。网络时代获得知识并不困难,但要把知识形成系统,使之有用,却不容易。笔者曾对技术与学术关系有过思考,认为在中国学术进程中,技术对学术产生影响的三个重要节点,分别是纸张的发明和应用、雕版印刷,以及近三十年来的数字技术。古籍数字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各种便利,另一方面又带来信息干扰。如何在海量数据中捕捉有用信息,仅仅依靠关键词检索很难做到。这需要研究者独特的思考以及专业化训练。各种知识性错误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相关学科知识储备不足,对检索到的信息不能有效甄别和合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另一个学术难题,是“伪学术”问题,比如“伪校点”“伪学术”等现象时有发生。不过,这个问题,不只是“制度与文学”研究须尽力避免,恐怕还需要整个学术界共同面对。

---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8—19 页。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4 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5 页。

The Achievement, Dilemma and Way Out of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and Literature

Wu Xia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last 30 years,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ese system and literature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formed a unique research paradigm, changed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pattern to some extent, and 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Its academic origin, root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eory of Western literary sociology and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academic field. But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there also appeared a lot of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failure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excavate the connot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and literature". Too much emphasis was put on the external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so the aesthetic problems within literature could not be well solved. The summa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stem and literature tended to be too simple and too direct. The research was too dependent on digital retrieval, thus causing knowledge-typed mistakes.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not only reflect the adaptability betwee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our future research, but also rethink of the origin of the system so as to construct new research theories and academic methods, doing our utmost to avoid the knowledge-typed mistakes and the phenomena like "pseudo-textual research and criticism" and "pseudo-academics"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Key words: system and literature, academic history, achievement, dilemma, way out

(责任编辑　管　琴)